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6.06.026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1949~1966)

樊荣^{1,2}, 秦燕¹

(1.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2;
2.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建国后前十七年的中国社会形态经历了两次变革,党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根据革命时期的重要经验,能否顺利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支持程度,因此,党充分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通过对建国后前十七年党关于农民教育的报告、指示、决定、意见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勾勒出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进程,揭示不同历史阶段教育政策的承接性;借用教育政策的结构动态生成理论分析农民教育政策的外围环境、教育政策、政策实施之间的关联性,揭示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及农民教育政策实施对于农民主体的价值作用和经验教训;从理论维度和路径维度论证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期为新时期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教育政策;演进逻辑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6)06-0163-07

引言

党历来重视农民教育,为了保障农民教育能够切实有效地进行,制定科学的农民教育政策是关键。当前农民教育的实效性不足可以折射出教育政策的缺陷:重政策内容本身,轻政策实施环境;重技术培训,轻思想政治教育;重教育机构正规教育,轻农村社会的日常教育等。本文通过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农民教育政策演进,总结经验教训,为破解新时期农民教育实效性低的困境提供突破口。

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

特殊的一段时期,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重大变革,党在这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经验,党充分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制定和实施农民教育政策对农民进行全面教育,使之逐步接受全新的阶级意识、国家观念,认同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时期农民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少,且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从国家意志出发,采取自上而下的单向模式,以某一政治运动为视角进行分段式研究,脱离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场域,未能关注由国家阶段性发展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研究——以延安时期农民教育为考察对象”(编号:11XKS007)。

[收稿日期]2016-04-21

[作者简介]樊荣,女,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秦燕,女,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递进关系决定的农民教育政策内容的连贯性,导致了研究的碎片化。二是单纯从静态视角分析党制定的农民教育政策文本及其实施的效果,没有对教育政策内部结构进行解剖,未能找到政策演变的机理所在。究其原因,在于对教育政策概念理解不全面。“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教育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依据和准则。通常人们把党的领导机关和国家机关分别或联合发布的有关教育的纲要、决定、通知、规划、规定、意见、办法、条例等都看成是教育政策。”^{[1](P.8)}这只是教育政策的静态表征,而教育政策还是一个有目的、有组织的动态发展过程。

本文基于以上对教育政策概念的界定,将通过对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党关于农民教育的报告、指示、决定、意见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勾勒出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历史进程,揭示不同历史阶段教育政策的承接性;借用教育政策的结构动态生成理论,分析农民教育政策的外围环境、教育政策、政策实施方法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农民教育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变迁的内在逻辑,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政策价值及其失误所在,以期为新时期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一、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一) 扫盲识字是农民教育的切入点

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将以扫盲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教育作为农民教育的切入点。在1949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必须建设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2](P.87)}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指出,扫盲识字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改良生产技术、提高政策思想水平的先决条件。12月,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认为,过去农民教育采取的冬学形式行之有效,今后仍应积极发展。为了巩固扫盲成果,一些脱盲的农民有了继续深造的诉求,农民教育开始由季节性的业余学习转向常年业余学习,将农民业余教育的规定逐步规范和细化。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

求,在农民识字率提高后,开始注重培养农业技术人才。1959年12月,在《全国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农民教育必须大力培养技术力量。1962年12月在《关于农村业余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再一次提出,农村业余教育“积极地有计划地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培养农村需要的各种初级技术人员,为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逐步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发挥积极作用”^{[3](P.109)}。

(二) 政治教育始终是农民教育的中心

政治思想教育是农民教育的首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由封建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导致宗族血缘制度权威趋于瓦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内传统的东西被推翻,党按照新的社会主义蓝图彻底改造乡村,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一方面必需教育农民了解和认同新政权新国家,能够与社会变革相适应;另一方面党也需要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地位。于是,党在开展各种运动着力进行政治、经济改造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农民进行国家认同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农民逐渐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2月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教育中抗美援朝时事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农民业余教育工作必须和这个运动取得密切配合,以扩大农民中间的爱国主义教育”^{[3](P.19)}。通过教育使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和事实,“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心理”^{[2](P.436)}。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开展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号召农民声援和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为了保证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央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民阶级成分的决定》,明确了阶级成分划分及土地的征收、没收和分配政策,并将其作为新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为了澄清干部和群众对土改的错误理解,提高其阶级意识,认清贫困的根源,必须进行土改的意义、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中要求,要“推进增产节约和爱国公

约运动,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助以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3](P.23)。

1952年底,随着土改运动的顺利结束,农村出现了“李四喜现象”^①、中农化现象、两极分化现象等新问题。为了克服这些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不相符的问题,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需不断地向农民灌输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于是,在12月的《关于一九五三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今年冬学一般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其内容应特别注重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总路线”^[3](P.35)。至1956年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得以确立,我国由此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势在必行。根据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一场以两条道路大辩论、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大辩论和整党、整团、整社为主题的三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9年12月,在《全国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提出了“抓思想,政治挂帅”的口号。在1963年4月的《农民业余教育汇报会纪要》中,也强调业余学校普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阶级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对于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起到了一定作用。1965年12月7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今冬明春开展农村业余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强调,农村业余学校必须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提高农民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见,对农民教育的政治化色彩越来越浓重。

二、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

分析农民教育政策演进,除历史的方法外,还有能够揭示政策演进机理的逻辑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是把事物的历史进程以逻辑的形式再现出来,从理论的形态上把握对象,揭示其规律的方法。”^[4]逻辑方法有利于我们认清政策演进的深层原因和运行机理。借用结构主义理论,在动态生成视角下可以把教育政策分为三个层面,即外围层、中间层和内核层,三者相互作用引起结构性的动态变迁。外围层指党在制定农民教育政策时的国家宏观政策和社会思想文化状况等;党制定的关于农民教育的政策、法律、法规属于中间层;内核层是农

民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政策办法。党的农民教育政策演进是外围层—中间层—内核层三者互动的过程。外围层是党制定农民教育政策的价值导向,凝聚着制定主体的价值倾向、利益需要;中间层是解决把农民教育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需更多顾及实践主体——农民——的利益要求,是教育政策的价值生成过程;内核层的教育政策是中间层的具体化,直接作用于农民,通过农民接受教育内容的效果提供反馈信息,引起中间层教育政策的调整,也会推动外围层的社会发展变化,是教育政策的价值实践。可见,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是价值导向—价值生成—价值实践的辩证统一,这正是农民教育政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 国家发展目标递进: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价值导向

1949~1966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整体性社会变迁必然引起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这构成了农民教育政策的外围层,引导农民教育政策中间层的制定和内核层实施与之相随不断调整。教育目标从建国之初的强调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到过渡时期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深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

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面临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需要大批政治文化过硬的技术人才和普通劳动者。因此,这个阶段的教育政策一方面提出文化先行,让农民尽可能地享有文化教育的机会,采取冬学的形式进行扫盲识字,适当地配合政治、生产技术教育,以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抗美援朝运动、土改运动等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农民教育政策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对农民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使农民摒弃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宗族的传统观念,开始具有国家理念、认同国家目标,不仅自愿接受了国家权威,也自觉承担了支援国家建设的义务。与此同时,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向农民大力宣传阶级划分、土地分配的政策,通过翻身、算

^① 李四喜是《新湖南报》以刚刚翻身的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朱中立为原型而虚构的名字,四喜意指土改运动使朱中立有翻身、分田、娶妻、生子四件喜事。但在土改运动后,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出现了松气、退坡现象,认为不需要再革命了,存在只埋头生产、不过问政治的思想。

账、诉苦、忆苦等生活话语,在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消灭地主阶级的决心的同时,使他们明确了自身的阶级身份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进而在农民思想和情感层面建构起党和国家作为解放者、庇护者的形象,树立起国家新政权的政治权威,促使农民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1953~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土改完成后,各地农村出现了中农化和两极分化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实现集体化生产,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这与农民传统的土地私有观念相悖。因此,党以革命的战斗热情动员农民,进行总路线、宪法、农业互助合作等教育,深化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把党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强有力地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使农民适应乡村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要求,在实践中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7~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由于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局限性,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经历的短暂的过渡时期,于是认为可以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甚至出现了超越共产主义的设想。于是,1958~1959年再一次掀起了全民学习文化的高潮,各地纷纷提出扫盲跃进计划。1959年10月在《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中要求,要在2~3年完成扫盲。在政治教育方面,教育农民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描绘了共产主义新乐园的美好生活。1963~1966年间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四清”、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运动,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对农民、农村干部和知识青年进行政治教化,以培养农民社会主义的集体意识,实现农村由合作化向公社化的转变,为彻底完成党对农村政权组织的改造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 确立农民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价值生成

对农民教育制定怎样的政策和法规,这属于教育政策的中间层。由于党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所以在制定政策时,与旧社会的统治者有很大不同,更能为民众考虑:既满足农民利益需求,又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既对农民进行改造,也推进了社会

进步。

党的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是农民主体身份的定位过程。“农民的主体地位包括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定位和农民自身的主体意识,前者强调党和政府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以及平等基础之上给农民更多的话语权,后者诠释农民自身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感。”^[5]新中国成立后,党借助教育动员农民积极参与一系列群众运动,逐步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首先,明确农民的主体身份。在1950年12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就明确指出,“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使工人、农民取得了作为国家基础的政治地位,也取得了享受各级正规教育的政治权利”^{[3] P.4)},这一思想贯穿于各个时期的农民教育政策中。土改运动是对农民阶级主体身份界定的重要阶段,使农民特别是贫雇农阶层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在经济上实现了翻身;取代了原有地主、乡绅的乡村传统精英的地位,成为党在农村基层政权的骨干力量,在政治上实现了翻身。正如河南省叶县小营村的贫农李金相所讲,“现在和往年比,世道大变了。穷人在村里不但能说话,能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还翻了身,全村的人都分到了一份土地、房屋”^{[6] P.79)}。抗美援朝教育使农民把爱国作为自己行为的内在价值标准,明确了自己是国家建设的主体,具有了一种作为国家主体应有的自愿支援意识。如广西省兴安县花桥村村民喊出“缴纳公粮加强国家建设,准备迎击和消灭美国侵略者”的口号,全村公粮任务不到一天就全部入库。^[7]有的村民还写信给在部队的儿子,谆谆嘱咐说“要好好练武习艺,随时警惕着美国鬼子的进犯,一定要保卫着我们神圣的国土。”^[8]其次,尊重农民的主体身份。在党关于农民教育的文件中多次提到要坚持自愿原则。1956年3月,《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中提出,“组织群众识字,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不许强迫命令。”^{[3] P.77)}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教育农民要采取自愿互利原则。1962年在《关于农村业余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再一次指出,要“按照群众的意愿办事,量力而行,不要勉强”^{[3] P.110)}这调动了作为政策价值主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广大农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

党的农民教育政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了农民的主体价值。首先,努力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党制定农民教育政策的目的很明确,即提高农民政治

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1950年教育部在《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工农教育在此阶段一般应以识字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和卫生教育。1959年的《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农民业余教育要注意贯彻政治、文化、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可见,农民教育内容包括政治、文化、技术、卫生几方面,旨在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其次,尊重农民实际。农民在文化启蒙阶段缺乏学文化的自觉性,便根据农民不愿耽误生产的心理特点制定教育政策,采取灵活多样的冬学形式,让农民体会到文化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随着农民参与教育的心理转变和文化基础的提高,逐步将冬学转变为可常年学习的业余民校形式,推进农民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保证教育的效果,根据农民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区别对待。1950年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就指出,各地的情况不同,农民觉悟程度亦有差异,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和要求,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规定不同地区的教育内容。在1954年的《关于一九五四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中也提出,组织农民学习,必须适应农村生产情况,根据不同对象、不同要求,采取各种形式进行。

(三) 引导农民广泛参与: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的价值实践

内核层的具体教育政策更侧重实践,政策选择不能脱离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政策目标需求,更取决于受教育者的客观实际。在1949~1966年对农民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作为教育政策实践者——农民——的重要性,农民的参与度是评判教育政策效果的直接因素。

1. 群众运动形式确保农民广泛参与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间,为了农民教育政策能够尽快落实见效,开始借助群众运动形式动员农民参与。1949年12月,在《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冬学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地执行依靠群众办学的群众路线,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与群众要求,启发群众自觉自愿地入学,严格防止强迫命令的错误。”^{[3][P.3]} 1950年,《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明确了“工农教育,是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必须贯彻群众路线。”^{[3][P.13]} 在扫盲识字运动中,建议冬学教员“应尽可能的多抽时间接近群众,熟悉群众生活,体验农民的情感,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在教学中

有计划的进行解决。要关心群众,听取群众意见,随时改进。”^[9] 在土改运动中,由于土地问题与每个农民利益息息相关,便以此为突破口激发广大贫雇农的政治热情,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到对地主的斗争中,为土改运动的顺利完成奠定了群众基础。

2. 教育的日常生活化便于农民广泛参与 建国初期,党将教育实践活动与日常生产生活相渗透,为广大农民参与教育提供便利条件。1950年12月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中提出,农民教育应逐步转变为常年业余学习,并辅以各种分散形式的识字班或灵活多样的小组(如地头小组、粪堆小组、炕头小组),利用生产空闲时间继续学习,在麦收和秋收农忙季节应予放假。吉林磐石县农民李书秉说“这样学可太好了,不耽误工,又不熬夜,把字学了,一点也不累。”^[10] 1954年3月,《关于一九五四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要求,各地应积极组织识字组、读报组,借助乡村习俗和农民喜欢的幻灯片、黑板报、秧歌、话剧、赛诗会等形式巩固农民识字成果。由于形式形象生动,贴近农民生活,多用农民群众语汇,用农民所熟悉、易接受的话语方式诠释国家政策,可为更多的农民所接受并付诸实践。因此,农民对这些新生事物接受得越来越快,已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也成为党在日常生活中向农民渗透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途径。

三、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和政策实践说明,农民教育政策实施的成果不仅满足了社会发展需求,同时又推动了社会进步,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轨迹相顺应,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

(一) 理论维度: 教育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相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问题,解决阶级划分和社会主义国家认同等问题,把农村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此后,开始逐步解决公有制经济基础问题,中国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个

环节的完成都在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然而,党在理论上的目标建构与农村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面临着农村生产力水平落后、剥削阶级和个体私有制经济依然存在、农民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较低、对社会主义了解较少等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宏伟目标,党根据国家发展不同阶段的目标,不断调整农民教育政策,以实现重塑农民的目标,反映了农民教育目标的逻辑演进与国家历史发展轨迹的高度统一。在此过程中,既要看到国家对农民实行自上而下模式的教育改造,也必须承认农民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解释、接受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时所表现出的自下而上的自觉努力,循序渐进地改变弥散无序的家庭至上的传统观念,树立社会主义的集体观念,建构与新政权要求一致的新意识形态体系,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奋斗。

(二) 路径维度 “内与外”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路径有两种:一种是以外围层的社会政策演变为起点,依次调整和变革农民教育政策中间层和内核层的变迁方式,即为“由外到内”。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受到社会形态变革目标的直接支配,而社会改造过程中势必涉及到人的改造,尤其是对思想的改造。党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根据不同时期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需要农民具备的素质不同、接受的思想观念不同,对中间层和内核层的教育政策从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形式、教育管理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在教育内容方面,1949~1952年强调文化教育,为加强政治教育提供前提条件,1954年以后政治教育就成为首要任务;在教育对象方面,最初为识字扫盲阶段的全民教育,而后根据受教育者的诉求、国家建设的需要、地方客观实际等因素选择了重点教育对象,明确着重教育的对象顺序是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青年男女;教育形式也由最初的冬学转变为可常年学习的民校。另一种是以内核层的具体政策作为演进起点,根据农民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对内核层的原有教育政策进行重释、修订和扩展,引起中间层教育政策的调整,推进外围层社会发展目标的变迁,为党和国家下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制定提供依据和基础,可称为“由内到外”。建国之初,农民缺乏接受教育的自觉性,但国家建设又迫切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因此,党对农民进行教育,使得农民的文化基础不断提高,政治意识不断加强,运用所学的阶级意识、国家观念参与社会改造

实践,在推动社会变迁的同时,必然带来教育政策外围层的变化。“由外到内”体现了教育政策对社会政策的顺应性和被动性,“由内到外”表现出教育政策对社会政策的主动性和改造性。因此,党的农民教育政策的完整演进过程是“外—内”与“内—外”两种路径有机结合的过程。

四、失误与教训

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演进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但统一中也包含着差别和错位。党在1949~1966年改造和治理社会的过程,也是凸显精神和价值意义的理想主义与强调物质和工具意义的理性主义之间的竞争过程,是理想主义对理性主义的超越,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深受其影响而具有了局限性。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愿景的指引下,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短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设想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此外围层政策的引导下,党在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思想,超越了农民主体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忽视教育政策变迁必须符合自然演进的规律,夸大了政策制定主体权力意志主导下的理想主义的作用,认为只要通过对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教育和塑造,凭着农民的政治热情就能实现整个国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在这种走向极端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浮夸和形式主义的现象,比如人民公社运动就演变为在一种强制状态下的政治管制和思想束缚的教育,这严重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最终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结语

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剖析1949~1966年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政策演进的历史脉络、逻辑归因和路径模型,同时从中折射出的党与农民的互动关系及其运动机理,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农民教育政策实施对于农民主体的价值作用及其经验教训,进而揭示了农民教育政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对研究当前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无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党作为农民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在思想上始终重视农民教育,明确农民是政策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必须依据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农民教育政策的目标、内容、方式;必须兼顾不同层次农民的真实诉求,做到与农民群体的层次性、复杂性契合,既要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更要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

[参考文献]

- [1]孙锦涛.教育政策学[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2]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教育部工农教育司.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Z].1979.
[4]文大稷.试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J].学校党建

与思想教育 2010 (12).

- [5]李飞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主体地位的历史演变——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3 (3).
[6]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7]新华社,中南财政部通讯组.发扬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各地人民热烈缴纳公粮入库[N].人民日报,1950-12-17.
[8]劳动模范民兵英雄带头推动华东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农村[N].人民日报,1950-11-25.
[9]石瑛.怎样巩固冬学?[N].人民日报,1951-01-18.
[10]许行等.地头炕(炕)头,到处都是学堂[N].人民日报,1950-06-03.

(责任编辑 张立伟)

The Evolvement Logic of Peasant Educational Policy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 R. C (1949 ~ 1966)

FAN Rong , QIN Ya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72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Shanxi 03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17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 Chinese social formation experienced two major 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According to the key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revolutionary times , whether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can be completed is mainly up to the supporting degree of peasants. S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ll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ducation of peasants. By combing document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orts , instructions , decis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peasants , this article draw the outline of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of peasants and reveal the continuity of education policy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y analyzing dynamic relation between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 education policy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rough education policy's structural dynamic generative theory , this article fi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education evolution of peasants , trying to restore history of peasant's education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olicy adjustment , which can make people recognize its historical function objectivel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asant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Evolvement Logic